

26.8.39:Saturday:

Cot up in the morning with general
and fishing
when felt
mail of new
'National
many photo
air mail.
cup of rat



27.8.39:Sunday:

巴苏日记

商务印书馆

K265/
29

(071443

巴 苏 日 记

〔印度〕 比·库·巴苏

顾子欣 王其良等 译

顾子欣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8年·北京

DM76/12

B.K. Basu

**Dr. B.S. Basu's Diary
(1938-1943, in China)**

根据巴苏大夫英文手稿译出

巴 苏 日 记

〔印度〕比·库·巴苏

顾子欣 王其良等 译

顾子欣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551-5/K·76

1988年8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41 千

印数 10,000 册 印张10¹/₄ 插页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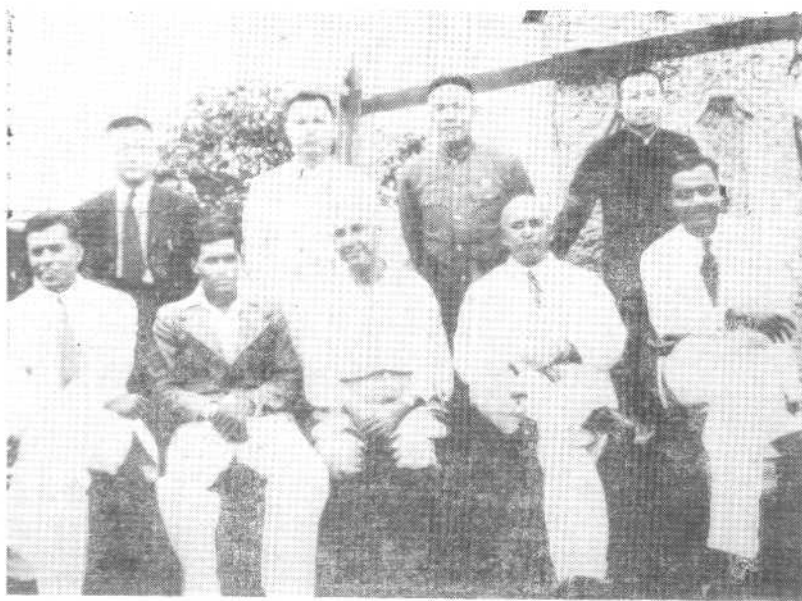
定价: 2.9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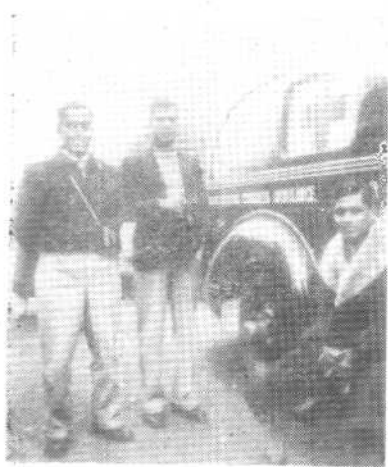
比·库·巴苏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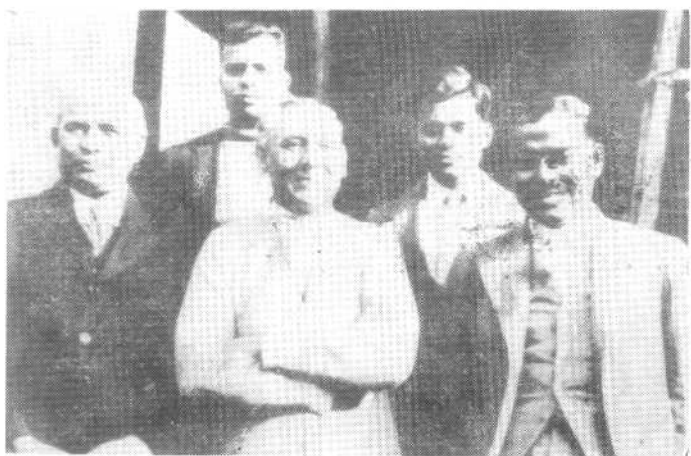
1938年9月1日，奈都、哈蒂·辛格等亲友以及华侨和中国驻印度外交官在孟买送别印度援华医疗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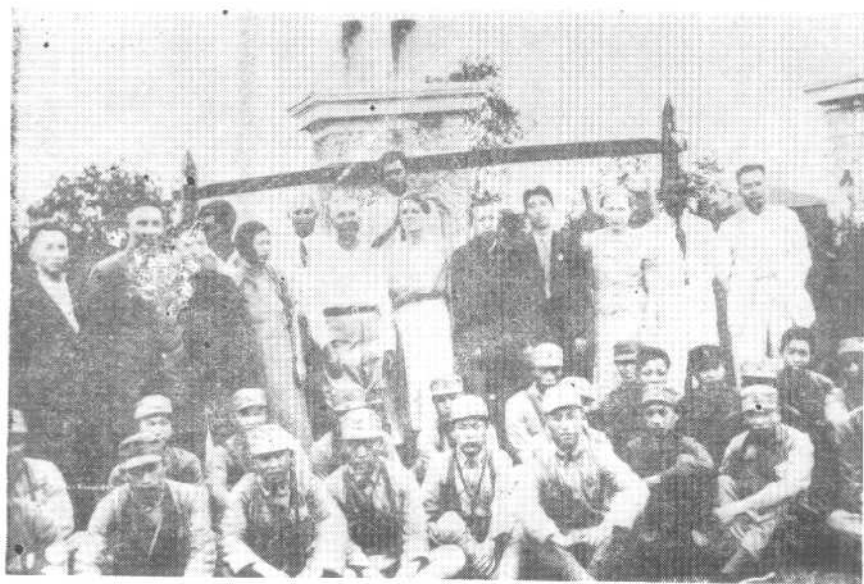
1938年10月1日，叶剑英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成员后合影。
后排左二为叶剑英。



1939年1月10日在重庆，巴苏(左)、
木克吉(中)和柯棣尼斯在印度国民大会
援华的救护车旁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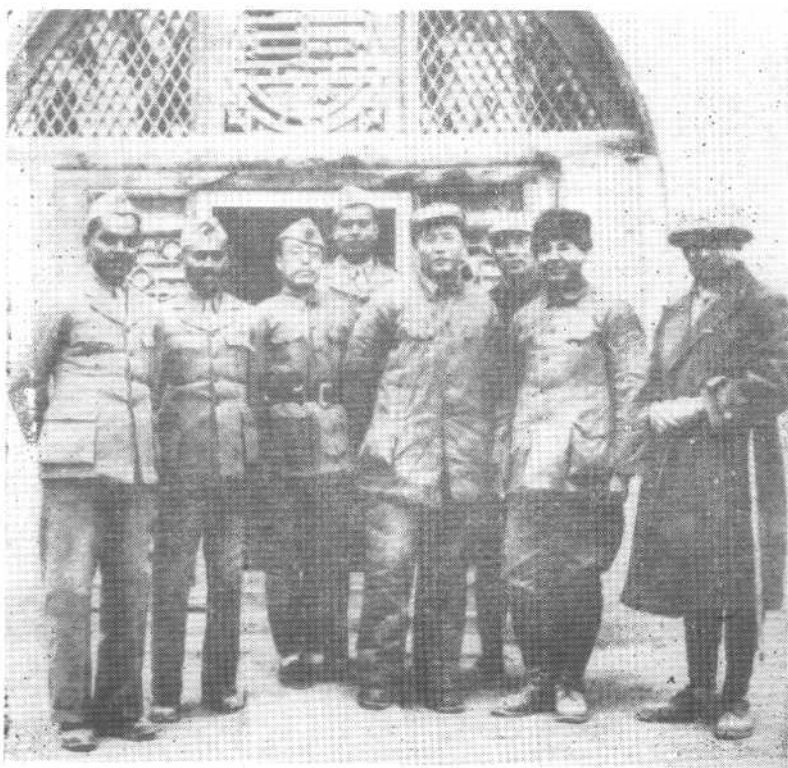
1939年1月在重庆。左起：卓克尔（副队长）、木克吉、爱德华（队长）、柯棣尼斯、巴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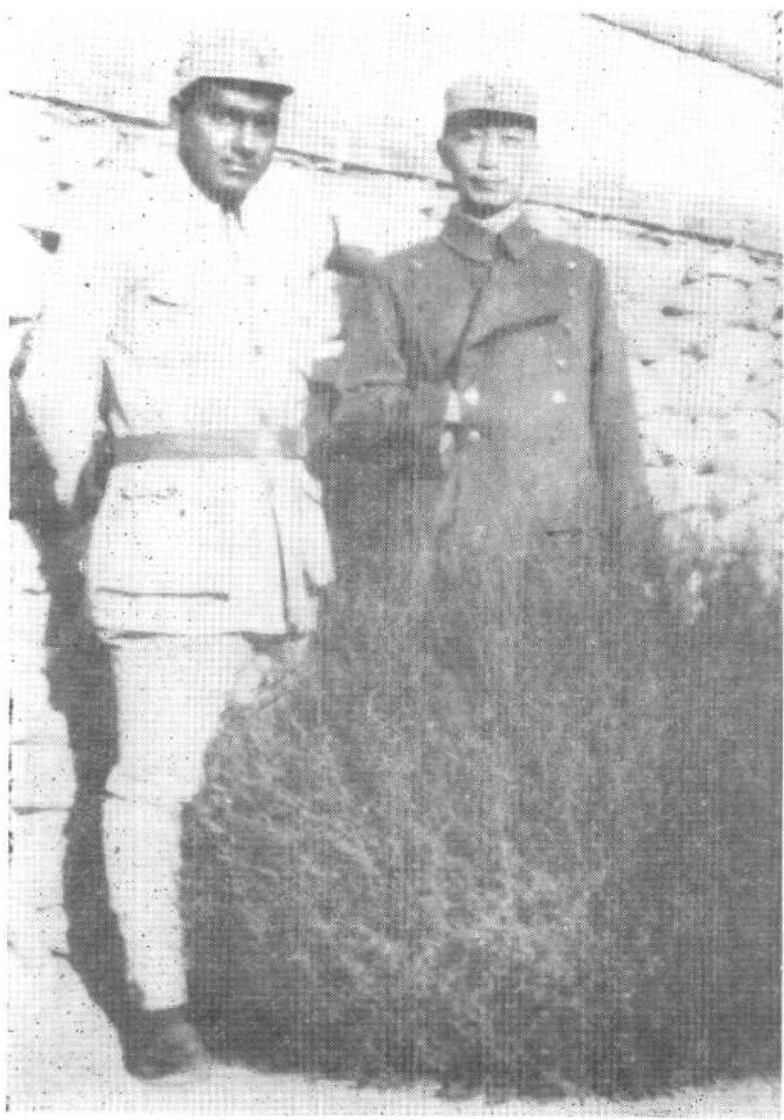
印度援华医疗队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部分工作人员联欢后合影。后排右一为叶剑英，右三为王安娜，右六为史沫特莱。



1939年2月12日，延安人民夹道欢迎印度援华医疗队时，爱德华等五人与高跷演员合影。



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时的合影。



1940年7月，在晋察冀军区，巴苏与聂荣臻司令员合影。



应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邀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1978年访问印度，在抵达加尔各答时，巴苏大夫给代表团团长王炳南佩戴花环。



1982年12月8日，巴苏在石家庄举行的柯棣华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1982年12月14日，叶剑英委员长在家中会见由巴苏大夫率领的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代表团和柯棣华大夫的亲属时，同巴苏亲切会面。



1982年12月14日，在北京图书馆参观印度援华医疗队图片展览时，与马海德合影。



1982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巴苏大夫率领的全印柯棣华纪念委员会代表团和柯棣华的亲属时，同巴苏亲切叙谈。

五位印度医生中国名字的由来

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重庆时，谭云山应五位医生之请，为他们各取了一个中国名字：

M.M.爱德尔的中国名字是：安德华

M.R.卓克尔的中国名字是：卓凯华

D.S.柯棣尼斯的中国名字是：可棣华

B.K.巴苏的中国名字是：巴思华

D.木克吉的中国名字是：慕容华

要说明的是，后来报刊上称呼他们时，又将安德华称为爱德华，可棣华称为柯棣华，巴思华称为巴苏华。

译者的说明

巴苏大夫的日记，有在他的异国即中国的旅途中记的；有在敌后行军时记的；有在战场上记的。当此紧张而又匆促的时刻，再加语言文字的隔阂和历史背景的不同，日记中有些人名、地名等等，我们虽几经查考，仍无法从英文译出以还中文的本来面貌。对此，我们只得根据英文来译音并在脚注中注明英文原样。

此外，日记内容也反映了巴苏大夫到我国之初并不了解中国的一些历史事件，如把淞沪抗战误为“九·一八”等，还有些记述又与事实有出入。为保持日记的原貌，我们决定原文照译。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同志有：顾子欣、王其良、任鸣皋、吴晓春、李桐连、马海容、朱长昺、谭航萍、李敬中。全文由顾子欣同志负责校定。限于译者的文字水平和历史知识，不免有错，望读者批评指正。

他为中印友谊奋斗终生

——悼巴苏大夫

王炳南

正当秋风萧瑟，草木凋零之时，我得到了巴苏大夫去世的消息。我的心猛地为之一沉：岁月催人，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最后一名队员已溘然长逝，走进历史人物的行列中去了。我追念旧情，思绪萦怀，哀痛难抑。

巴苏大夫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也是我个人的一位至交故友。在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五名医生中，我与巴苏大夫交往的时间最长，相识最深。

我第一次见到印度援华医疗队和巴苏大夫，是在1938年9月。当时，医疗队到了武汉，我受党的指派接待过他们。医疗队由爱德华大夫任队长。巴苏和柯棣华是医疗队中两名比较年轻的医生。柯棣华面容瘦削，温文儒雅，举止有些腼腆。巴苏则长着团团的圆脸，胖敦敦的，一副朴实厚重的样子，很象中国的农家子弟。他们刚到中国不久，显得很是兴奋。周恩来同志在武汉接见了医疗队。9月30日晚，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又在四川饭店设宴欢迎他们。叶剑英、董必武、凯丰同志出席了宴会。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也在座。那是一次洋溢着国际主义情谊的聚会，大家一次又一次地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印度的独立祝酒干杯。

以后医疗队到了重庆，因为我们住的距离近，更时常有机会见面。重庆遭敌机袭击，医疗队为救护受伤的市民，曾工作至深夜。柯棣华和巴苏更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一马当先，拚力抢

救。他们的工作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1939年1月下旬，医疗队离重庆赴延安。原来决定由我陪他们上路，后因我另有工作，便委托也要去西北视察“工合”工作的路易·艾黎与他们同行，在路上给予照应。医疗队出发那天，我来到他们的驻地送别。我看见在山坡下一所加拿大教会办的教堂外面，停放着一辆救护车，车上插着一面印有手纺车图案的印度国大党党旗。我知道这车是国大党送给中国的礼物。艾黎整装待发，正在路边等候我们。我和医疗队的五位大夫一一握手道别，目送着他们欣然就道，奔赴延安去了。

从此，医疗队在抗日前线跋山涉水，辗转各地，救死扶伤，贡献卓著。他们的模范事迹在抗日军民中是声闻遐迩，有口皆碑的。巴苏和柯棣华更是形影不离的一对战友。他们总是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担负最繁重的工作。他们曾在聂荣臻同志领导的晋察冀军区治疗伤员，参加过百团大战。他们受到了炮火的洗礼。正象巴苏大夫自己所说的，他们“已成为八路军及其指挥下的游击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1940年12月，巴苏从晋察冀返回延安，在八路军卫生部附属医院任耳鼻喉科和眼科主任，和马海德医生一块工作。在延安期间，他还被光荣地选为边区参议会的议员。医疗队中的三位大夫（爱德华、卓克华、木克华）已陆续回印度去了。柯棣华后来积劳成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巴苏大夫是这个医疗队里在中国工作时间最长的人，直到1943年6月才取道重庆，乘飞机回到加尔各答。自重庆一别至医疗队离华，五年中我没有再见到他们，只是通过几封信；但我是很惦念他们的。周恩来同志曾告诉我，他去延安时见到印度医疗队的朋友们，他们也曾关切地问起我。

随着巴苏大夫离华返印，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使命也就宣告结束了。但巴苏大夫仍在坚持不懈地工作。他在印度国内广泛地旅

行，介绍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1943年10月，由他发起成立了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以发扬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精神，继承柯棣华大夫的遗志，加强中印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团结。在此后的数十年里，无论中印关系出现什么情况，无论是阳光灿烂或阴云凝聚，巴苏大夫都高擎着中印友谊的大旗，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在改善中印关系方面，他曾起过先驱者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1976年的冬天，巴苏大夫率领全印柯委会代表团来华访问。我和他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在武汉时，我们都还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这次重逢都已成两鬓皤然的老人了。叶帅和聂帅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巴苏和他的代表团。其时刚打倒“四人帮”不久，巴苏也为中国人民除此大害额手称庆。他的心是与我们喜怒哀乐无不相通的。随后，我同他一起去石家庄参加柯棣华纪念馆落成典礼。在漫天飞扬的大雪中，我们俩共同抬着花圈走向柯棣华的陵前。我见他摩娑着柯棣华的墓碑，怀念战友，以拳拭泪。他还在落成典礼上发表讲话，表示决心为改善中印关系，发展中印两大民族的传统友谊竭尽余力。

1978年，我率领友协代表团应全印柯委会之邀访印，巴苏大夫不辞辛劳，作为主人充当我们的全程陪同。正是在这次访问中，我代表黄华外长向印度瓦杰帕依外长发出了访华邀请。我与瓦杰帕依会晤时，巴苏大夫也在场。瓦杰帕依指着他对我说：“他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也是我们之间友谊的桥梁。”访印的最后一站是巴苏大夫居住的城市加尔各答。我们到他家里去作客。邻里的孩子们挥着彩旗欢迎我们，奔走相告：“巴苏大夫家来中国客人啦！”他的家也是针灸诊疗所，他是第一个把中国的银针传播到印度去的人。目前针灸疗法在印度已颇具规模，这首先也要归功于巴苏大夫。在印度人民的心目中，巴苏大夫的名字是和中国的

医学，和中印友谊联系在一起。

此后，巴苏大夫差不多每年都来中国访问，他把中国看作他的第二故乡，他对中国有一种牵肠挂肚的心情。1984年我得知他身染沉痾，心头十分沉重。去年夏天，他来北京治病，住在协和医院，胡耀邦同志曾亲自到医院去看望他。后来他病情好转回印去了，我还希望后会有期。不料终因药石无灵，他的心脏在本月¹²日那天停止了跳动。

巴苏大夫的精神将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丰碑长存，永志不忘。

临终前的思念

——介绍巴苏大夫的日记和他同

中国人民的伟大情谊

高 梁

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比乔埃·库玛尔·巴苏大夫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当人们仍然在沉痛怀念他的时候，我收到在印度用英文出版的他的日记。阅读之后，使我对他更加想念和缅怀，引起我无限的哀思。

这本日记是他临终前，在病榻上忍受着巨大病痛，奋发精神，亲手加以整理定稿，由他的朋友们出版的。日记约三十万字，主要记载着抗战期间他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亲身经历。他给这本日记起名为《延安的召唤》，书的内页写着“献给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的英勇战士们”。

我心爱地捧着这本日记，读着，想着，悲痛地思念着这位饱经风雨、享年74岁的印度友人。我仿佛倾听到他临终前在不断呼喊：延安，八路军，朱总司令……他的音容笑貌、茁壮身影、微黑的面庞和善良而有神的眼睛、他的不平凡的一生，都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心中涌起千思万绪。

1937年抗战爆发后，朱德同志呼吁世界人民支援中国的抗战。26岁的印度共产党员巴苏，当时从医科大学毕业不久，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由印度国大党发起组织的五人援华医疗队，于1938年9月来到中国。医疗队在国民党统治区逗留一时期后，来到了延安。他们在艰苦困难的日子里，为八路军医治伤员，为边区群